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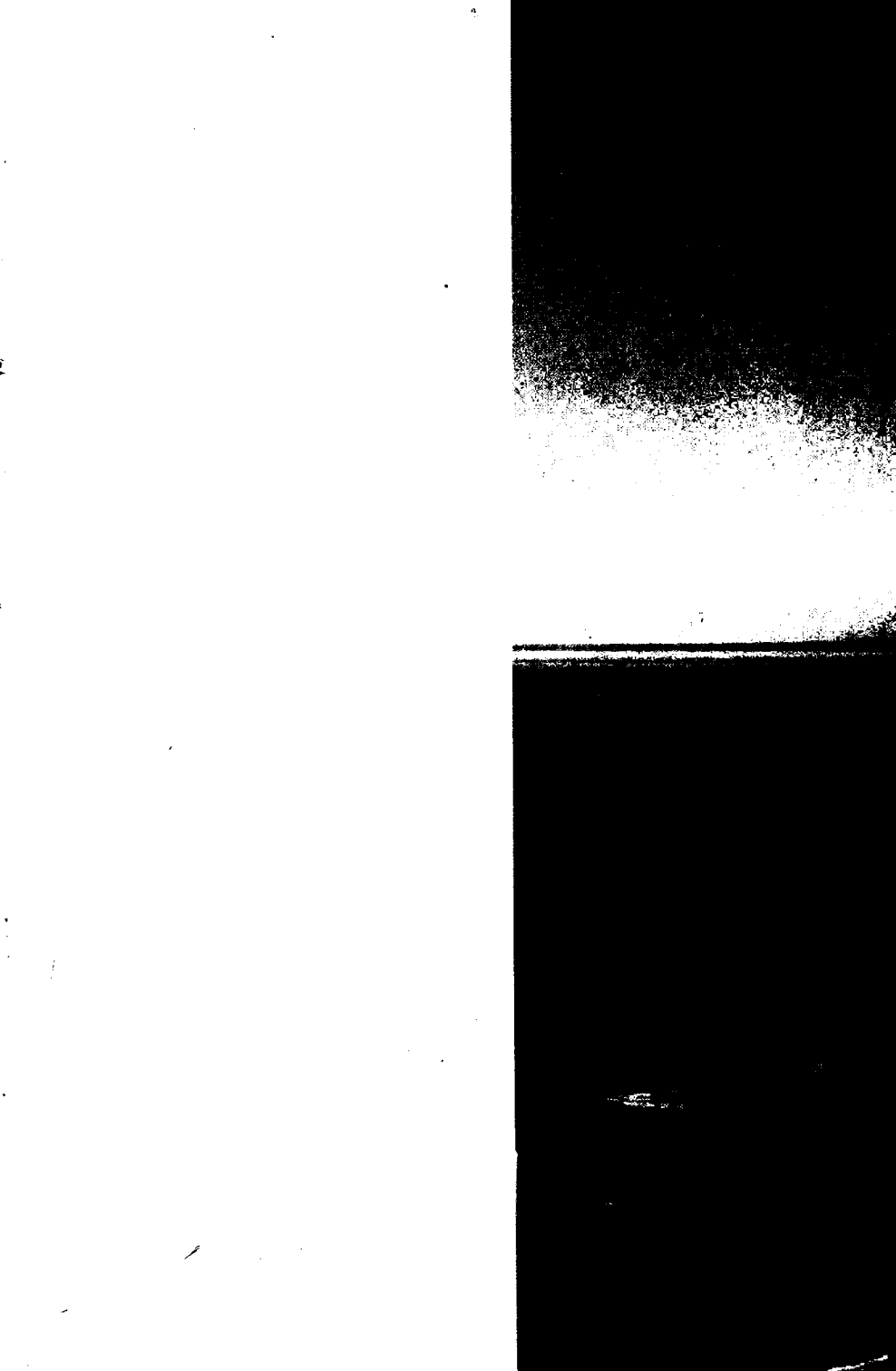
上海南

历史论文集

作者简介

苏云峰(1933-)，原籍海南三亚市保港镇。1961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197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1985年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自1962年起，先后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等职，1999年退休，现为兼任研究员。在研究院外，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和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论文指导教授、论文考试委员以及中国丘海学会理事长、海外华人学会理监事等职。主要著作有《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1976)、《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1981)、《私立海南大学，1947—1950》(1990)、《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两)江师范学堂，1903—1911》、《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等六本，并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论文五十余篇。



《海南历史论文集》序

——史论踔绝人云峰

朱逸辉

苏云峰先生是名重海峡两岸的学者。记得1989年10月，我应邀赴新加坡出席该琼州会馆135周年庆典暨第一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有次在与台北市海南同乡会代表团李耀勤先生亲切的交谈中，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一些琼籍作家、诗人、教授，从此苏云峰的名字便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云峰兄是海南崖县（现为三亚市）人，1933年生，1950年赴台，编入陆军第64医院当看护兵。他不甘现状，向医院领导请长假报考新竹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三年，继续台湾师范大学国文专修科二年，转社会教育系图书馆组再读三年，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管理员，负责图书馆业务。由于他工作认真，喜爱研究，郭廷以所长送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哲学暨社会科学系攻读，获硕士学位。1985年3月至8月，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他一步一个足印，成为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

1994年4月，我和海南大学教授李昌邦、王春煜、张本、《海南日报》政论家钟业昌等一行，应台湾中国南风学会的邀请，出席该会和中华经济研究院联合召开的“海南经贸发展和人文建设”学术研讨会。同云峰兄，可说是一见如故。我们住在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

心。苏云峰、王逸如兄嫂以老乡和东道主的身份，热情地接待我们，并主动安排在他们家里用早餐，予以无微不至的关照，使我们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随后，我和云峰兄的感情步步加深，别后切磋学问的信函(传真)不断。双方出版的著作互相赠送。他的大作《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国现代化之区域研究——湖北省》、《私立海南大学》、《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等书，使我读后获益良多，对他的为人为文、顽强拼搏精神肃然起敬。

1979年，他风华正茂，升为研究员，学术研究正达高峰时，突然患了鼻咽癌。这一巨大的打击，一般人是难以承受的。然而，云峰兄泰然处之，接受电疗，勇敢地面对现实，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写作不辍。现在《海南历史论文集》一书将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云峰兄多次传真来，嘱我写序。对云峰兄人品及学术造诣，我自愧不如，并且研究领域不同，何敢言序？！于是婉辞再三，春节过后，云峰兄又传真来：“我是希望您为我写个序。”他言辞恳切，我若再作推辞，则有所不恭了。

《海南历史论文集》是云峰兄多年研究海南历史文化专稿的结集。内收文章13篇，附录5篇，都是很有分量的佳作。这些文章，反映云峰兄除了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外，对区域史湖北省与海南岛的研究也很有见地。海南自西汉开郡至今已两千多年，除宋、明二代外，其他各代统治者始终不重视海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致使海南发展缓慢，人才缺乏。尤其是元代，海南在外族统治下，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海南汉人又处于最低地位(四等公民)，因此终元一代97年，海南只出了两个举人(一为琼山人唐兴道，一为澄迈人李震器)，没有一人登进士。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对海南的开发建设颇为重视，府州县官员重视兴学育才，海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均有所发展。明代海南土地充分开发利用，从而使其他经济作物也大有发展。其种植主要有椰子、槟榔、南药、水果以及棉、烟等。由于教育的发展，海南文化鼎盛，贤才大起，形成了一个以宋

明理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遍布全岛的文教网。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文化系统全面成熟的标志,它造就了明代海南岛的一批文化名人:中举人者 594 人,中进士者 64 人。其中官至大学士、尚书、侍郎、都御史等正三品以上的大官不下十人。其中:丘浚、海瑞、冯颐、邢宥、薛远、唐胄、廖纪、钟芳、郑廷鹄、王弘海、王佐、梁云龙等都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清代,由于满族统治,海南又大大落后了。

云峰兄对海南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如他的有关海南区域史研究论文 13 篇和专著《私立海南大学》,始终紧扣区域发展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论述。我们海南解放以后,“加强防卫,巩固海南”实际上成为指导海南岛工作的战略思想。国家认为海南是国防前线,有意识地不把重要的工业项目设在海南,使得海南的工业处于长期落后的局面,且当时海南的重大企业由中央和广东省管理,导致海南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有待改善。1988 年海南建省,原以为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利于集中全国力量支援海南;二是有利于海南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三是有利于简政放权,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办事效率”(原国家民政部长崔乃夫文章《为什么要设海南省》)。有些专家提出“二十年赶上台湾”等。那么,海南的现状如何呢?建省 14 年来,海南的陆海空立体交通体系基本建成,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热带高效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等等,都是建省后所取得的成就。但各级机关并没有“简政”,不是什么“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官衙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数亦不少,祖宗土地卖了许多,高楼大厦建了不少,财政收入却一年比一年差,有的市县还拖欠教师的工资。海南省每万人供养的省级官员为 2.6 人,而广东仅为 0.3 人。可见海南人民的负担仍然是较重的。云峰兄说:魏晋以后,汉移民始进入海南,大都是世家大族,流寓家庭及落难官、商,他们为海南带来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海南的“内地化”比台湾更高、更早,而且“内地化”与“土著化”同时进行,并不发生冲突,这是与台湾不同的地方。海南同时也是中国边疆,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甚有发展前途,但从清代以来最不受中央政府重视

的地区。在清代仅曾纪泽、张之洞两人认识海南的重要性。云峰兄在《张之洞与海南建设》一文中的论述,发现因张之洞重视海南的国防地位,在中法越南战争中,以“制法救台”的战略,于谅山一役大败法军,令其撤出基隆和澎湖,解除法军对台湾的封锁。此一深具历史意义的研究,是近代史与台湾史学者所忽视的。此外,该文还从军事、政治、经济、交通和民族关系改善等方面论述张之洞对海南的建设,认为张之洞具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拓殖精神与魄力。此外,云峰兄对东南亚琼侨移民史、星洲琼侨与中国革命、星马华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奉献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华侨是革命之母,且也是抗日的英雄。详述七七事变后,星马华侨(含琼侨)的救国运动。以及陈述日军对星马华人的种族迫害,与华人的武装抗日组织活动。从而探讨日本的“华侨对策”,日军残暴的原因,以及中、英、马共(琼侨领导)联合抗日的成就和局限等等。近著《海南苏氏源流考》,也可视为探索海南早期移民的一项研究。总之,该书是一本研究海南历史的专书。作者在写作上忠于海南历史真实;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他用心之良苦——既有引证史料出处,又有实地调查研究的依据。真正是:

天涯海角出苏公,
大笔挥扬气若虹;
勤奋著书有千卷,
史论踔绝入云峰。

在我国加入 WTO 的今天,这一部对台湾、海南作为比较对象进行研究的专著,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2002 年 3 月 12 日于春泥斋)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前海南文化局副局长、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

自序

海南为中国南端最大的一个海岛,面积比台湾略小,但可耕地面积比台湾大,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丰富。如果把南海四沙包括进去,则其有待开发的资源,尤其丰富。这种观点是在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我国学者于20世纪20年代,也纷纷前往海南作实地调查,结论与外国人所见相同。70年代来由于南海四沙海底礁层石油资源的发现,引起越南、菲律宾,甚至马来西亚等国的觊觎,主权争论迄今未决。

海南于1988年建省后,虽有长足进步,但相对于台湾的过度开发,仍为一个亟待开发的处女地,其重要性不限于经济潜力与人口移殖方面,在国防与对南洋诸国的贸易上,也居重要地位。历史上,海南的战略地位曾受到关注,也曾扮演过这个角色,尤其是当中国和越南关系紧张的时候。

海南之进入中国版图,较台湾早1700余年,其“内地化”起步很早,程度也较台湾为深。可惜,民国元年以后,中原多故,海南为各路军阀盘据蹂躏,中央政府无心关注,以致一蹶不振。何以致此?是值得大家研究的问题。

海南为边陲之地,其“内地化”过程艰苦卓绝,也有惊人的成绩。新谓“内地化”,指中国之边陲地区的原始文化逐渐出现中原同质文

化的过程。其条件大致是：一、政治上，必须归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管辖。二、汉族移民之增加，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并产生民族间的血统交流。三、必须发生中原文化的移植、传播与生根作用。海南内地化的过程，正好如此。

海南的先住民是黎族，据考古调查发现，黎族大约于殷周之际，也就是距今 2800 年以前，已由东南沿海地区来到海南，经过七八百年的繁殖，为数已甚为可观了。所以于汉武帝派遣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军征讨南越，于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设珠崖、儋耳二郡以后的百余年间，不断发生与土著的冲突事件。汉光武帝时期的马援南征，率兵万余，楼船二千多艘，亦仅取得暂时的控制。三国时代的东吴孙权，有意岭南，曾于公元 242 年派兵三万，讨伐珠崖、儋耳二郡，然而“招抚其人，竟不从化”。比较成功的统治，发生于隋统一前后的 60 年间（540 ~ 600 年），其关键人物为冯宝及其能干的土著夫人冼氏。冯氏为魏晋时期逃亡岭南的汉族后裔，而冼氏活到 80 岁左右，故能有效发挥治理功能，受到史家的称赞。惟其后裔分据海南，又产生豪强割据的局面，以致有唐一代（619 ~ 906 年）对海南的统治，并不巩固，而仅以之为放逐政敌的场所而已。大约到了宋代（960 ~ 1279 年），才发生有效的统治，并建立教育制度，发展文化。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时代。但是必须指出，汉、黎关系之敌对状况，并未就此结束。明清二代都有人提出治黎对策。19 世纪 80 年代，张之洞曾敕平一次客黎叛乱。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间的冲突事件尚未曾完全消除。换言之，文化上的内地化虽然成功，而政治上的控制，则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要谈海南之内地化，非讨论人口移植及中原文化之输入不可。

谈到汉人移植，应先了解海南的人口结构概况。前面提到，黎族是海南的先住民，汉人是何时进入此蛮荒之地的？有人说在秦汉以前，但提不出可靠证据。不过，我们可以说，至少于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设置珠崖儋耳二郡以后，汉人应就开始向这里移植了。1957 年在儋县及临高二处发掘出来的汉代五铢钱，应该是可靠的证据。但

是海南在清代以前一直被认为是蛮荒之地,是中央政府放逐政治敌手和罪犯的地方。所以在自然状况下的人口移殖,应当有限。惟每在中原政权受到北方异族侵袭崩溃,或改朝换代的时候,大群移民就会涌入海南,因为这里是别无选择的避难场所。这类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发生在五胡乱华(318年)之后、唐末五代之乱的52年间(907~959年)、南宋时期(1127~1279年)及元末明初(1360~1390年)时期。但这些迁移,都只能见诸文字记载,而无确实的人口统计。据陈光良等学者研究,唐代以前有汉人2万人,唐代7万人,宋代10万人,元代约17万人,明代47万人,清代增为217万人。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大约于明代时,汉族移民人数应已超过黎族,此外还有苗、回等民族杂居其间。据1928年至1940年的各种调查统计,汉族约220万人,黎族约30至40万人,其他民族为数很少。又据1973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1953年之海南黎族共有33万人,苗族仅3万人,黎苗合计约36万人,汉人数字未详。但据1978年之部分统计推算,全海南人口共1 634 000人,汉族902 000人,占55.2%,黎族680 000人,占41.5%,其他少数民族52 000人。如果这个数字可靠,则黎族人口比民国时代增长一倍多,而汉族人口则减少一半以上。其原因为何,有待深入研究。

汉族人口之增加,自然会发生中原文化之传播现象,这是海南“内地化”的指针。到底中原文化之输入海南,何时开始?何时生根?何人扮演重要角色?是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一般认为海南之有文化,与苏东坡有关,但根据史料,此种说法不对。一因远在唐太宗时代(626~649年),被贬为珠崖吉安(今儋县)县丞的王义方,就已在其县治所在“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了。这应该是中国文化在海南开讲的最早记录。不过,其效果和后来之发展情形未详。二因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设立琼州府学及儋州州学以后,教育逐渐发展,海南士子也参加科举考试,不久就产生了海南的第一代生员。故苏东坡于1097年到海南之初,就已发现此地“衣冠礼乐,斑斑然矣”。及其定居儋耳后,时与当地青年诸生、生员

及老书生往来,有一位生员远从琼州(今琼山)前来随苏东坡学习半年,甚获苏氏之赏识,而于东坡离开海南后三年,也即公元1103年乡试中举,成为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再过六年(公元1109年),又出现第一位进士。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苏东坡抵达海南以前的五十年间,中原文化已经在这块蛮荒之地上生根,而于他离开后迅速成长。官师、流寓、落籍的北方大族和以苏东坡为榜样的谪臣,都有贡献。海南于宋代出进士12位,举人23位。元代仅出举人二位。明代出进士62位,举人600位,成绩辉煌。清代迄道光十二年(1840年),出进士22位,举人150位。这是中原文化成功输入、传播和生根发芽的最佳证明。而这些成绩,远非台湾可比。但是台湾后来居上,而海南则自明朝以后,往下滑落。这是值得有识之士深思的问题。

记得小学时教科书上说,海南和台湾是中国的两大眼睛。台湾注视太平洋,海南面控南海,在国防上同等重要。台湾因有海峡阻隔和国际因素,18世纪以后,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重视,而海南则因接近大陆而被忽视。如果没有2001年4月的中美撞机事件,恐怕很多人还不知道海南在何处。我出生于海南,成长于台湾,两相比较,颇有不平之鸣,起而为海南撰写论文,分别在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迄今累积有十二篇之多。这些论文于宣读时都获得好评,有的被《世界日报》、《历史月刊》、《南风》等刊物转载,有的被用作历史研究所专题研究参考论文。海南大学中文系王春煜教授来信表示阅读再三,感到内容精辟,望我早日出版,以唤回海南人已经丧失的历史记忆。退休后乃整理修订成本论文集。吴凤莲小姐为我打字排版、校对、扫描制图和转换为简体字档,又蒙北京三联书店杜非女士推荐,获得海南出版社袁大川先生之同意,由海南出版社发行,令我有落叶归根之感,在此谨表十二万分的感谢!

(本文原系1983年为王会均《海南文献资料选编》所写之序文,修改后觉得很适合作为本论文集之序文)

导言

本论文集,除第一篇属通论性外,其余均依时序先后排列。各篇主要内容如下:

海南和台湾都是汉移民社会,然而其移民之时间和发展,却有很大的不同。本论文集第一篇即比较二者之殊异。在时间上,海南之汉移民早于隋唐时代,而台湾则迟十六七世纪。在汉移民动力方面,台湾拉力大于推力,而海南则是推力大于拉力。海南的汉移民来源和结构比台湾复杂,早在宋代时,海南北部已出现以士绅为主轴的移民社会,是“内地化”最成功的边疆地区。关于“本土化”亦即移民之落籍问题,台湾汉人要等到日据时代,才被迫落籍台湾,而海南之汉移民,从唐宋起多即已落籍海南。自称是海南人,亦是中国人。表示“本土化”与“内地化”同时发生,并无冲突。于汉移民之两性比例方面,海南较台湾为平衡。至于汉移民和土著(所谓汉番)之间的冲突和摩擦问题,海南亦比台湾激烈持久。两岛之土地资料相似,但在经济开发上,台湾比海南较为进步。

海南直到民国时代仍被视为文化落后的蛮荒之地,本论文集第二篇介绍宋代的海南教育,证实苏东坡于 1097 年被贬到海南以前,海南已建立完整的教育制度,设立教育机关,诸如州县官学、书院、私塾、书馆、书会所、会友堂等,由于部分官师的努力,和谪臣如苏东坡

(1038~1101年)、李光(1077~1157年)、胡铨(1102~1180年)等人的热心施教,传播中原文化,开启读书风气,有宋一代,除产生23位举人和12位进士外,还出现一位无师自通,才气纵横,“出入三氏,笼罩百家”的琼山道人葛长庚(白玉蟾,1194~1229年)。本篇利用《琼州府志》、苏轼的《东坡集》、李光的《庄简集》和胡铨的《澹庵文集》等史料,重建这一段被遗忘的教育史,为明代之海南文教奠定基础。

明代的海南文教蓬勃发展,达于高峰,人才辈出,丘浚、邢宥与海瑞等,仅为其中之佼佼者。本论文集第三篇即介绍丘浚(1421~1495年)的生平。他在海南接受基础教育,通过乡试,取得举人功名后,北学于中原,进士及第,由翰林编修,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和武英殿大学士,居于宰相的地位,让北方学者和同僚跌破了眼镜。本文探索他成名的原因,介绍他的世家和早年教育,少年抱负和挫折,学术成就和功业、个性和政治恩怨以及他晚年的乡愁。对明清学者对丘氏的褒贬,本文也有中肯的评述。

丘浚入阁居宰辅之位后,同僚朋友好奇,纷来询问,海南怎么出了像他这样的人才?他不胜其繁,乃写《南溟奇甸赋》作答。本论文集第四篇即从他的这篇赋中,窥视明代海南之自然生态与人文经济社会。丘浚于赋中说,他之所以有今日成就,非纯系他个人因素,而是由于海南有优美的自然、人文环境和丰裕的农业经济基础所致。他说我海南“今则礼义之俗日新矣,弦诵之声相闻矣,衣冠礼乐,彬彬然矣!”他的同乡好友邢宥(公元1445年进士)亦说:“海南村老非真村,家能识字里能文,读书大意破孔孟,险夷拙巧知区分,得钱只欲买书读,不置田庐遗子孙……禾收三熟杂粳糯,仓积穰^(早稻)穰^(晚稻)稼如云。”这不是丘浚和邢宥所虚构的社会,历史研究证明,明代海南的人口、农业、贸易与教育文化,都是历代的高峰,从王宏海(进士)1558年奏请“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以便于海南主持乡试一折中,我们发现海南生员每科渡海赴广州应乡试者,“不下数千人”。有明一代共出举人600位,进士62位。单就举人而论,是宋元二代合计的24倍,清代的四倍。可以说是一个书香社会,丘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

已。

清代以后,由于海盗和黎族的叛乱频繁难治,雍正乾隆间,已有主张放弃海南者,及西力东渐后,海南的传统文化日益衰落。张之洞(1837~1909年)出任两广总督后才改变旧观。本论文集第五篇《张之洞与海南的建设》,叙述张氏两广总督任内,为有制法国海警以解台湾之危,特别加强海南防卫措施,于越南凉山之役,击败法军,迫其签订条约,令“法兵退出基隆台湾澎湖”。之后令冯子材带兵赴滇,平定客黎之乱,从而展开各项建设。整顿吏治,关心文教,改绿营为练军,修筑海口秀英炮台,拟建榆林军港,以杜法国之覬覦。在经济方面,开发海南山地资源,修建井字山路,招商垦地,开矿伐木,建立安全的自由贸易墟市,促进汉黎间之商品贸易,此外,还同意商办环岛轮船航运,畅通人货,繁荣地方,均卓有成效。本文证明张之洞是清代历任两广总督中,最关心海南的一位疆臣。他希望把海南建设成一个永治久安、黎汉共存共荣的边疆社会。不幸他转任湖广总督后,人亡政废,恢复旧观。

海南土地资料与台湾相若,然而农业生产始终未能自给,民间和政府亦曾作过努力,本论文集第六篇《从南洋经验到台湾经验》,介述1945年以前琼侨、广东省政府及日人从事海南农业改良的情形。南洋经验指赴南洋谋生的琼侨,带着资金返回家乡,组织公司,从事种植咖啡、橡胶、胡椒、烟麻等南洋经济作物,自清季至1927年间,颇有成绩。大陆经验指北伐统一至七七抗战前广东省政府建设厅“琼崖实业局”,从大陆引进各实验农场的改良经验,从事包括农林、渔牧和工矿建设,不论在组织、人力、资金和技术方面,均能全面照顾,且以科学的精神,积极进行各种改良试验,有非常可观的成绩,创海南历史上的空前记录。其关键人物为省主席陈铭枢、建设厅长林云陔、琼崖实业局专员黄强、绥靖公署委员陈汉光和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学院师生,亦都积极参与,惟正要开花结果时,被日本侵华战争中断。台湾经验是日本占领海南后,招徕30余家株式会社,投资约十亿元从事各项产业开发,以供军粮

与战争所需物资。农业方面,共开辟 66 个农场,从事水稻、甘薯、甘蔗、蔬菜、烟草、果品、棉花和黄麻等作物的品种改良和生产,均有成绩。水稻试种,从台湾引进四个品种,其中以台中 65 号蓬莱米最为成功。可是这个成功的台湾经验,一因日本人没有培养海南本地农业科技人才,二因抗战胜利后,政局动荡,政府无心也无力赓续。总之,除南洋经验有后续发展外,大陆经验和台湾经验最后均告失败,其中原因,本文有客观分析和说明。

日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暴行,罄竹难书,“南京大屠杀”仅为其中之一而已。本论文集第七篇系揭露日军在海南的暴行,所根据者为当时香港《大公报》记者云实诚(文昌人)的目击报道、琼崖守备司令丘岳宋的《海南岛抗战纪要》、日本《海南岛关系书类纂》、新近发现的“田独万人坑”及“八所港万人坑”等资料,以及我个人和家兄苏盛屏身受迫害的经验。资料虽不够完整,如最近才现身的海南“慰安妇”等史料,尚未包括在内,但已将日军的部分残暴行为,呈现于世人之前,海南人尤其不能忘记。

本论文集第八篇《抗战胜利后的海南政经社会》,原为《私立海南大学,1945~1950》一书之绪论,兹辑录于此,以填补战后海南史事论述的空白。由于政治不上轨道,国民政府对日产之接受变为“劫收”,致使日本留在海南的工农产业,全部停止运作,经济萧条,哀鸿遍野,而国共斗争愈演愈烈,社会残破不堪。于此背景下,一群海南精英,不顾艰难险阻,毅然创设私立海南大学,其热爱乡土之盛情,值得后人怀念。

由于南海发现储藏大量石油,外围国家竞相争夺主权,本论文集第九篇采用新的论证角度,从海南与南海的历史和地缘关系上,证明南海主权属于中国。在历史关系上,海南行政部门从宋代起,即已对南海水域进行管辖。在地缘关系上,本文提供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新证据:《更路簿》。这是海南渔民出海作业时使用的航海指南。现在所见官方公布的海南诸岛名称,有二分之一以上与海南渔民《更路簿》上所载者相同,其中,用海南音命名的地名,且为英海军及日人采

用。西力东渐后，国力衰退，海南渔民为保卫南海主权，亦有英勇的表现。

如前所述，海南经济文化衰落，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正积极从事南洋产业开发，需要大量劳工，福建、广东和海南遂成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本论文集第十篇《东南亚琼侨移民史》，陈述 19 世纪后半叶海南人民成千上万到南洋打工谋生的情形。探索发生这股移民潮的原因和出洋的经过、出洋人口统计分析、每年出洋和返乡人数、出洋后之工作地理分布和发展概况，以及他们创业有成后，对桑梓的回馈和对祖国的贡献，上述农业改良的“南洋经验”和下面二篇文章，就是具体的证明。

华侨为革命之母，琼侨亦有贡献，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著作，无一字着墨。本论文集第十一篇《星洲琼侨与中国革命》，根据《中国国民党驻南洋英属新加坡第二分部党史》（第二分部即琼侨分部），及《国民党星洲分部历任职员一览表》两个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建构这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前项档案涵盖 1909 至 1932 年的组织活动和编年纪要，后项资料为 1921 至 1923 年间琼侨国民党干部的籍贯、年龄、职业和党籍等资料。研究发现，琼侨国民党部组织坚定，初由小知识分子与小商人领导，工人社会为基础，及国民党改组后，工人阶级转为主体，组织发展多至二千余人，他们不因国内革命形势顿挫而丧失斗志，捐献、联络、创办书报社和夜学，宣传革命，甚至返国参加革命行动，表现比南洋其他党部为佳。他们献身祖国革命事业，行动激进，即令被星洲政府镇压、逮捕和驱逐，亦在所不顾。

华侨不仅为革命之母，且亦是抗日的英雄。本论文集第十二篇为《星马华人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奉献》，分为二部分，前一部分详述七七事变后，星马华人（包括琼侨）的救国运动，包括捐献金钱、医药、车辆、飞机、回国服务或在当地参加抗日行动。后一部分陈述日军对星马华人的种族迫害，与华人的武装抗日组织活动。从而探讨日本的“华侨对策”，日军残暴的原因，以及中、英、马共（琼侨领导）联合抗日的成就和局限。文中充满星马华人被迫害的惨状，与对祖国

的英勇牺牲奉献精神。

以上为各篇论文内容之简介,至于附录五篇,均为有关海南之时论和论文短评。对开放改革后的海南前景,抱着乐观、希望和祝福。行文仓促,难免有疏漏之处,冀望读者诸君不吝指正。